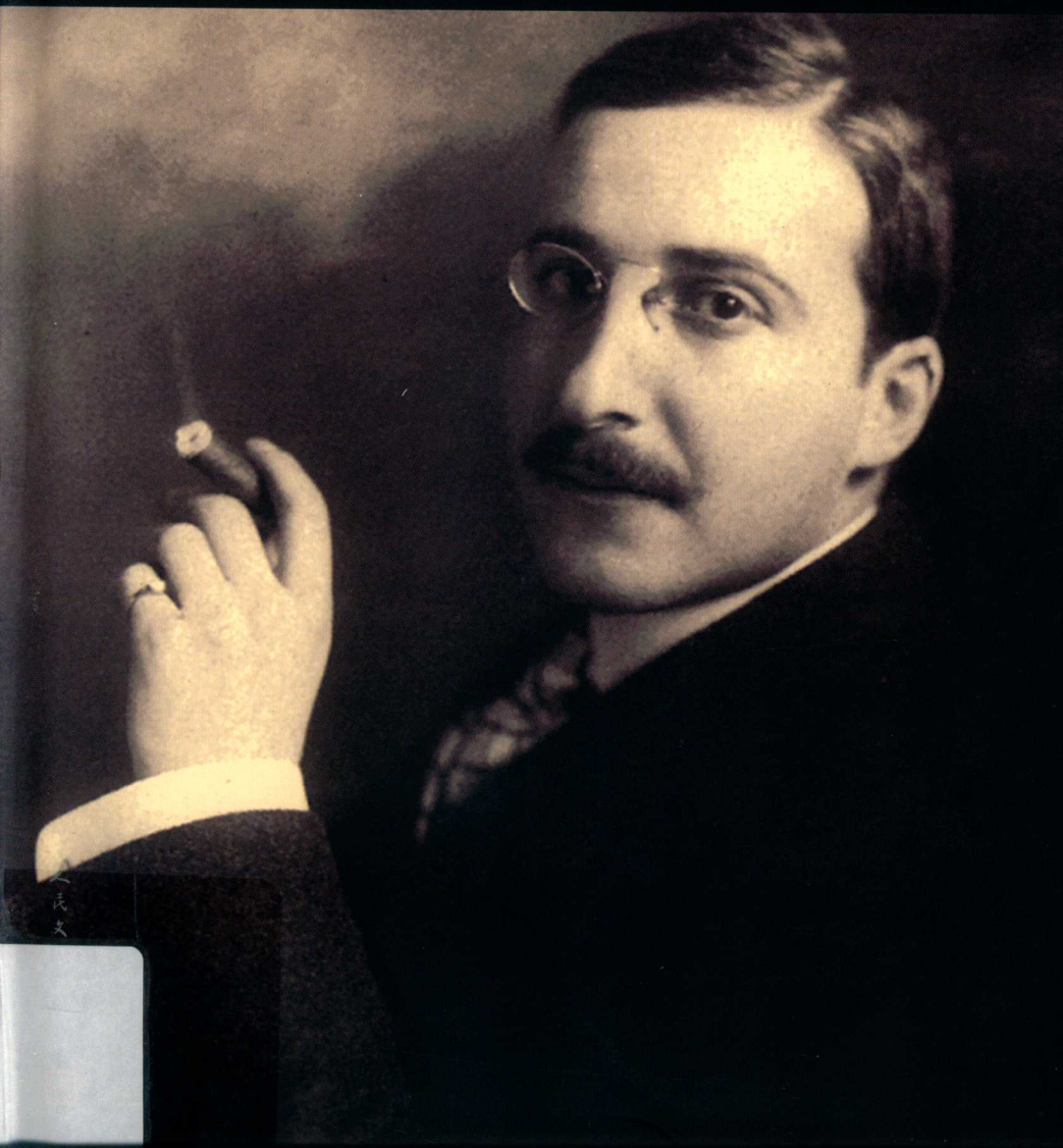


Stefan Zweig

茨威格小说全集 [IV]

[奥]斯·茨威格 著 张意 译



Stefan Zweig

茨威格小说全集 [IV]

幻梦迷离 克拉丽莎

[奥]斯·茨威格 著 张意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Stefan Zweig

Rausch der Verwandlung, Clarissa

分别根据 Fischer Verlag 1982, 1992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茨威格小说全集. 第四卷, 幻梦迷离 克拉丽莎/(奥)斯·茨威格著;
张意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ISBN 978-7-02-014744-1

I. ①茨… II. ①斯…②张… III. ①小说集—奥地利—现代②长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51476 号

责任编辑 欧阳韬
装帧设计 香云香
责任印制 任 祎

译者序

很长时间里,人们都认为《心灵的焦灼》(*Ungeduld des Herzens*)是茨威格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该书一九三八年问世,首部中译本由张玉书译,一九八三年以《爱与同情》之名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现在我们知道,茨威格生前还创作过另两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其实已完成,只是作家未交出版商出版,另一部则未完成。此次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茨威格小说全集》的机会,本人选择翻译这两部茨威格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并合为一册,希望读者对茨威格的文学创作和他本人都能有一个新的认识。

一九八一年人们在茨威格遗稿中发现了一部没有题目的长篇小说打字稿,茨威格研究专家克努特·贝克(Knut Beck,又译克鲁特·贝克)对此进行了整理并选取小说中“变化的陶醉”(Rausch der Verwandlung)一词命名。该书一九八二年由德国S.菲舍尔出版社出版,首部中译本名为《富贵梦》,一九八七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译者赵蓉恒。本人此次重译,以《幻梦迷离》之名呈现给读者。

《幻梦迷离》的写作时间应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间,曾因创作《玛丽·安托瓦内特传》而搁置。此后茨威格的写作一直在小说和传记之间进行。一九三五年茨威格创作了苏格兰女王

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传记。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他在写给汉斯·卡罗萨(Hans Carossa)的信中提到“要尝试一部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茨威格完成了航海家麦哲伦的传记,一九三八年在英国完成了他生前唯一发表的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茨威格的前妻弗里德里克讲到此书的写作时曾说“斯台芬在远方怀念起奥地利了,这真是罕见。”众所周知,茨威格一九三四年二月移居英国,是因之前他萨尔茨堡的家遭到搜查,据说是寻找藏匿的武器。对于茨威格这位享誉欧洲的和平主义者,这是极大的侮辱,他的身心深受打击,从此远走他乡。在英国写下这样一部发生在奥地利的小说的确可以视作他对家乡的思念。

这些年间茨威格的生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九三四年他结识绿蒂·阿尔特曼(Lotte Altmann),一开始绿蒂是他的秘书,后来两人之间产生感情。除一九三五年一月的美国之行和一九三六年的南美之行外,茨威格基本上都在伦敦和绿蒂在一起,而他的妻子弗里德里克则待在萨尔茨堡。一九三七年底茨威格的婚姻破裂,他回到萨尔茨堡卖掉那里的住所后回到伦敦,而弗里德里克则搬到维也纳,后经法国、葡萄牙前往美国。一九三八年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同年茨威格的母亲去世,哥哥移居纽约,茨威格身边没有任何亲人,自己也成为无国籍人士,同年年底申请英国国籍,申请在第二年三月才获批准。一九三九年夏,茨威格搬到巴斯,绿蒂继续担任他的私人秘书,这时茨威格和弗里德里克办理完离婚手续。九月茨威格和绿蒂在巴斯登记结婚。一九四〇年茨威格携绿蒂踏上前往美洲的旅途,从此在流亡之路上一去不返。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茨威格开始《克拉丽莎》(Clarissa)的写作。他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写给前妻的信里就提到过此事,他

说他想写一本有关奥地利的长篇小说,但是为此要查询十年的报纸,这只能在纽约做得到,而他一时半会儿不会去那里。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在给前妻的信中再次提到“我有其他的计划,甚至想写一本长篇小说”。茨威格最后一次提到这部小说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给贝尔托尔德·菲尔特尔(Berthold Viertel)的信中,“我在从事一些写作,也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是搁置了。”在小说草稿本的第一页上他写道:“只是起草了第一部分,也就是这个悲剧故事的开头,然后小说的写作因写蒙田的文章而中断,生活中各种事件的干扰也使我身不由己。”

茨威格最终未完成《克拉丽莎》,留下的只是草稿,这些草稿后在其遗稿中被发现,里面很多内容只是简单的笔记,还有很多不完整的句子。克努特·贝克根据茨威格的写作风格对小说内容进行了合理的拼接和补充,并根据女主人公的名字将作品命名为《克拉丽莎》。该书一九九〇年由德国S.菲舍尔出版社出版,终于与读者见面。

《幻梦迷离》的女主人公克里斯蒂娜一成不变的生活经历了一次“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只是“短暂的”“幻梦般的”,等到这个短暂、幻梦般的变化戛然而止之后,女主人公的真实生活没有发生丝毫改变,依然是那种无望、穷困、单调的生活,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摆脱,这就是女主人公的宿命,这让她愤恨、窒息和绝望。为此她一再在心里抱怨,但最后她不再抱怨而是义无反顾地要用真正的行动去改变这个宿命。

小说中的斐迪南绝对是茨威格笔下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一个完全的叛逆者!战争带给他无数肉体 and 心灵的痛苦,他憎恨毁掉他前程的战争,对战后奥地利行政部门的官僚主义恨之入骨!

他也为此在昔日战友和克里斯蒂娜那里大声咒骂。而这样的咒骂只会让他更加愤怒和绝望,最后他终于意识到只有奋起反抗才能摆脱被这个可憎恶的国家机器欺凌的命运。

小说通过斐迪南之口对奥地利战后现状的控诉异常犀利,切中时弊。而克里斯蒂娜和斐迪南最后打算实施的行为是对国家司法制度的公然挑战,但是两个人都未因此产生任何的良心不安。因为按照斐迪南的解释,这个国家亏欠他们的实在太多太多,他们只是讨回他们应得的部分。这样公然挑衅国家和法律的行为企图以及小说中太多强烈的社会批判言辞其实很不符合茨威格和平主义者的处事态度,这也许是他未发表这部作品的一个原因。他只能在文字上宣泄一下自己对社会的不满,但没有勇气真正和这个社会正面冲突。他更多把自己人文主义和和平主义的思想寄托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

其实茨威格的人生的确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可惜这些变化都不是“令人陶醉”的变化,而是令人心碎的变化。他原有的生活被纳粹的魔掌无情地粉碎了,他不得不离开家园前往异国他乡,他进行了很多尝试,但最终还是因为绝望于自己熟悉的生活不会再来而放弃了生命,给我们留下无尽的遗憾。而有关克里斯蒂娜的故事被作家封存起来,也反应了茨威格的矛盾和绝望,作家把她的命运作为悬念留给我们,我们有理由相信克里斯蒂娜是胜利者,她的命运也许会比茨威格的积极很多。

《克拉丽莎》里女主人公的男友是法国人,战争爆发后杳无音讯,克拉丽莎不敢和任何人提及他,甚至在自己父亲那里也不敢,只因为他是敌对国的人,也就是敌人,而怀上敌人的孩子又是何其大的罪过!茨威格也曾有过一位法国女友名叫玛尔赛乐(Mar-

celle), 她曾怀过他的孩子但最终流产。早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十日的日记中茨威格就提到要写他和玛尔赛乐的故事, 而写作《克拉丽莎》时茨威格不可能不想起这位昔日的情人。同样也是战争让相恋的人不能见面, 让至亲好友不能交往, 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留给茨威格最大的痛最终又出现在《克拉丽莎》中。而没有子女的事实也的确是茨威格的一个巨大心病。茨威格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给绿蒂的哥哥曼弗雷德和嫂子哈娜的信中这样写道: “对我来讲始终存在的问题还是, 战争结束后我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和悟性来享受生活。你们有你们的女儿, 你们一定可以的, 一想到这儿, 我就为你们由衷的高兴。”从这段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 茨威格自己处在悲观绝望的情绪之中, 但他坚信曼弗雷德他们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主要因为他们有一个女儿, 可见在茨威格眼里孩子是继续生命的重要因素。在茨威格一九四一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写给曼弗雷德和哈娜的信中还有这样一句话: “这个新世界是属于你们的女儿的, 我希望她将会看见并享受更好的时光”。由此可以看出茨威格对年轻一代的未来是寄予无限期望的。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写给贝尔托尔德·菲尔特尔的信里茨威格无比遗憾地写道: “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得为没有孩子而付出代价, 我的书是我其他的孩子, 但他们现在又在哪里呢。”

出于对家乡深深的思念和对自己以往生活无限的怀念, 茨威格在一九四〇年完成了自传《昨日世界》, 之后创作了《巴西——未来的国度》(*Brasilien: Ein Land der Zukunft*), 这两个题目给我们强烈的对比, 但是这个未来对茨威格可惜是虚无的, 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也无法拯救他。追忆完一去不返的辉煌的昨日世界之后, 他再也无法体会到任何继续生活下去的意义, 在这个时候写作《克拉丽莎》是以另一种方式追忆他失去的世界, 这就是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丑陋和战后的混乱,这其实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回忆,恰恰是一战的严重后果催生了纳粹在德国的迅猛发展和最终希特勒的上台,从此茨威格熟悉的昨日世界开始走向毁灭。

小说中的莱奥纳尔的社会和政治主张以及他对小人物的理解让读者很容易想起茨威格的法国好友罗曼·罗兰,就是他一直坚信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治愈社会各种疾病的良药。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驻美欧洲笔会的成立大会上茨威格曾在致辞中这样说:“只有我们在这个时刻对自己同时也对彼此保持信任,我们才尽到了我们的责任。”

就在一九四一年的最后一天茨威格还在给亲戚的信中写道:“现在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是这样一种可悲、可怜和毫无尊严的个人生活,就像被钉在一个地方的钉子,脱离了生命的伟大洪流,但是我们活着,希望着,期待着……”仅仅两个多月后的一个夜里,茨威格和绿蒂却匆匆告别了这个世界!他们选择死亡是因为他们突然停止了希望,停止了期待。茨威格再也没有可能给读者描绘克拉丽莎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〇年整整十年的人生经历,估计那绝对是艰难和痛苦的,但是作为一个坚强的女人,为了自己的儿子,相信她一定会顽强地生活下去的,当然是以自己的方式,走一个独立的、现代女性该走的路,不依赖他人,全凭自己的双手。

尽管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女性的就业和受教育情况得到了改善,但是整体来讲,在社会上男性依然居于主导地位,女性处于从属地位。茨威格能够在《幻梦迷离》和《克拉丽莎》这两部作品中将两位女主人公都描写为最终把命运掌握在自我手中,不再甘于成为牺牲者,不再是一副可怜的模样,这点实在难能可贵,也反映了作者笔下女性形象的改变和提升。

小说《幻梦迷离》的第一部分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奥地利中产阶级的衰落,第二部分则借斐迪南之口用更犀利的语言抨击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奥地利丑陋的社会政治现状,直接体现了茨威格对战争的不满和对战后劳苦大众的同情。其实茨威格在一九二四年发表的小说《看不见的珍藏》里就对战后通货膨胀让人一贫如洗的状况有淋漓尽致的描写,用的只不过是一种异常冷静、客观、有距离的叙述方法,完全没有《幻梦迷离》里强烈的火药味。在《克拉丽莎》中,茨威格将自己的个人经历和虚构人物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展示了战争带来的灾难、战后的社会动荡和百姓的艰难生活。可以说,两部作品都集中体现了作家强烈的反战情绪,彰显了作家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

今年是《幻梦迷离》首部中译本问世三十周年,借此本人向国内所有翻译过茨威格作品的前辈表达深深的钦佩和崇高的敬意,是他们用辛勤的付出和优秀的译文使国内一次又一次的“茨威格热”成为可能,也为茨威格在中国赢得了众多粉丝。今年也时值茨威格逝世七十五周年,现在首次把《克拉丽莎》呈现给中国读者也算是对茨威格特别的纪念。

张 意

二〇一七年二月四日于下花园

目 次

幻梦迷离 1

克拉丽莎 269

幻梦迷离

(遗作)

张意 译

奥地利所有的乡村邮电所都相差无几：看看其中的一所就可知全部。这些邮电所都建造于弗朗茨·约瑟夫^①时期，使用同一资源，里面的设备同样寥寥无几或者简单划一，在任何地方都让人感到憋屈，国库的捉襟见肘显而易见。就连坐落在冰川之中的最偏僻的蒂罗尔山区的邮电所，也都顽固地保持着那股老朽的奥地利行政机构的味道，一闻便知，这就是那冷丝丝的烟草味道和布满灰尘的卷宗霉味。所有邮电所的布局如出一辙：一道安装着玻璃板的木墙把房间按照严格规定的比例划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对外开放场所，一个是办公区。在对外开放场所没有任何可以就座的地方以及任何其他舒适的设施，可见国家根本不关心它的国民是否会在这里逗留时间较长。公共区域唯一的家具一般就是颤颤巍巍靠墙放着的歪七扭八的斜面写字台，上面铺着的那块破旧不堪的油布已经被无法数清的斑斑墨迹弄得黑乎乎的，在人们的记忆中那个嵌在桌子上的墨水瓶里看到的只是一团风干的墨糊糊，根本无法蘸着写字。就算桌上那个笔槽里凑巧有一支自来水笔，那它的笔尖肯定已经折断，根本写不了字。节俭的国库对于美观如同对于舒适一样的不上心：自从共和国把弗朗茨·约瑟夫的画

^① 弗朗茨·约瑟夫(1830—1916)，奥地利-匈牙利帝国皇帝，1848年即位。

像从墙上摘下来之后,拿来作为房间艺术装饰的充其量就是些海报,那些色彩特别扎眼的海报被贴在脏兮兮的石灰墙上,有的还在邀请人们去参观早已关张的展览,有些宣传购买彩票,在有些被人遗忘的邮电所里甚至还张贴着鼓励人们购买战争债券的海报。国家在公共场所的慷慨大方,充其量就显现在这些廉价的墙上装饰或许还有那个根本无人注意的“禁止吸烟”的告示上面。

相反,办公区域那边则让人格外肃然起敬。在这里,国家以最紧凑的方式象征性地展示了它不容忽视的权力和地域宽广。在那个被保护的角落放置着一个铁质钱柜,从窗户上安装的铁栏杆可以推测它那里时不时还真的收藏着数额可观的钱财。在工作台上闪闪发光的是一架莫尔斯发报机,上面的黄铜擦得锃亮,这可是个豪华玩意儿。旁边那部放在黑色镍制架上的电话机就显得朴素一些。这两个物件就引起人们一定的兴趣,深受尊敬,因为它们只要接上铜丝就把这个偏远小村和辽阔无垠的帝国联系在一起。其他邮政往来的家什就只好挤在一起了,包裹秤和装信的袋子,书籍,文件夹,本子,档案柜和那些圆形的发出叮当声响的邮资钱箱,秤和秤砣,黑色、蓝色、红色和紫色的铅笔,曲别针和夹子,绳子,火漆,海绵和吸墨器,胶水,刀子,剪刀和折纸器,所有这些邮政工作丰富多彩的小手工物件都玄乎地乱七八糟地堆在书桌那巴掌大的空间里。在许多抽屉和盒子里堆着各式各样的纸张和表格,满满当当的,简直难以想象。这些东西就这么近似挥霍地铺放着,但事实上这是假象,因为暗地里政府无情地清点着它那些廉价的办公用品中的每件东西,从用秃了的铅笔到撕碎的票券,从破成一缕一缕的吸墨纸到洗成小块的肥皂以及白铁洗手盆,从给办公空间照明的电灯泡到关门的铁质钥匙,国库都要求它的职员为每个用过的或者消耗掉的物件说明使用情况。铁炉旁边贴着

一份详细的物品清单,这是用打字机打出的,加盖了公章并带有无法辨认的签字。这份清单以算数的无情把相关邮政局哪怕最微不足道和毫无价值的企业物品的存在都标注出来。只要是这个清单上没有的物品就不能出现在办公空间,反过来,任何登记在册的东西必须都各就各位而且触手可及。国家机关就要求秩序和合法。

严格意义上讲,这份打字机打出的物品清单上也该登记上一个人,此人每天早上八点要拉起玻璃板,使用起那些原本毫无生命力的办公用品,打开邮政袋,给信件加盖邮戳,支付汇款,开具收据,给包裹过秤,用蓝色、红色和紫色的笔在纸上写出奇怪的秘密符号(密码),拿起电话的听筒,开动莫尔斯发报机的卷轴。但是出于某种考虑,这个被公众大多称之为邮政助理或者邮政主管的人并没有被登记在清单上。他被登记在另一本公务册上,而这本册子放在邮政管理局另一个部门的另一个抽屉里,同样是一份名单,能够审核和监控。

在这个被国家鹰徽神圣化的办公大厅里从来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关于劳作和消亡的永恒法则,碰到国库的界限砸得粉碎,邮局周围的那些树木枝繁叶茂,然后又变成枯枝败叶,孩子长大成人,老人寿终正寝,房屋坍塌又以另一种形式重建起来,国家机关就是用这种永恒的一成不变有意识地宣示着它的超凡权力。它范围内的任何一件物品如果用旧或消失,变样或衰败,领导部门就会定制并送来完全一样型号的另一件物品,以此给这变化多端的平凡世界一个国家优越性的典型例子。内容会消逝,但形式永远不变。墙上挂着一份挂历。每天都被撕下一页,一周七天,一个月三十天。等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挂历变得很薄,也已到头,于是人们要求一份新的,同样的版式,同样的大小,同样的印刷:又是新的一

年,但还是同样的挂历。桌上有个带着一行行列表的账本,左边的那页要是写满了,数字就填在右边那页上,就这样从一张纸到另一张纸。等到最后一张纸写满了,账本就记完了,那就再开始用另一个账本,同样的式样同样的版式,与以前的毫无区别。哪样东西要是不见了,第二天又会在哪里出现,同等的样式,就像那个机构,每个同样的木板台面上都一成不变地放着同样的东西,永远是同样形式的纸张和铅笔、别针和表格,再怎么换也是一样的。在这个国库空间里没有东西消失,没有东西补充进来,没有凋零和盛开,这里是同样的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延续不变的死亡。在那丰富多彩的物品系列中唯一不同的是物品老化和更新的节奏,而不是它们的命运。一支铅笔可以用一个星期,然后它就用完了,被一支新的同样的铅笔所替代。一本邮政账册可以用一个月,一个灯泡用三个月,一个挂历用一年。一把草编椅子的寿命是三年,然后会更换一把新的,而坐在这把椅子上消耗了整个一生的那个人的工龄是三十或者三十五年,然后一个新人就会坐上这把椅子。归根到底毫无区别。

在离克莱姆斯不远,坐火车大约两小时可到维也纳的地方,有个无足轻重的村子叫小赖夫林,一九二六年时,那里邮局的那个叫“公务员”的可替换的物件属于一位女性,因为这个邮局级别较低,所以官方称她为邮政女助理。通过玻璃板只能略微看到一个年轻女子的侧影,不怎么引人注目,但是挺可爱,嘴唇稍嫌单薄,面颊略显苍白,眼睛阴影下面有点发灰;在她晚上必须要打开那盏刺眼的电灯时,稍稍仔细一看,可以看到她的额头和太阳穴已经布上了一些细细的凹痕和皱纹。不管怎样,和窗台上的锦葵以及她今天放在白铁洗手盆里的宽大接骨木丛相比,这个姑娘绝对是小赖夫林邮局的物件中最鲜亮的,看上去至少还能工作二十五年。这